

ZHRMGHG

TJ

ZHONGHUA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

辽宁人民出版社

ZHONGHUARENMIN
GONGHEGUO
TONGJIAN



gongheguo

zhrm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

ZHRMGHTJ · ZHRMGHTJ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ZHRMGHTJ · ZHRMGHTJ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编委会编 .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12
ISBN 7-205-04473-1

I. 中… II. 中… III. 中国-现代史-1949~1999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846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字数: 3000 千字 插页: 5 印张: 125

印数: 1—1,000 册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英健 姜艳波	责任校对: 赵学良 刘再升
王 松 蔡文祥	赵耀今 吴广君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280.00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编委会

顾 问: 张静如

主 编: 龙 德 蔡 翔

副 主 编: 黄 艳 林红霞 王光祥

编 委: 朱红文 纪 元 李秀琴 周 丰

李梦白 马道魁 毛爱华 李 陆

编写人员: 王炳林 杨 青 黄 艳 李秀琴

李梦白 王光祥 纪 元 马道魁

毛爱华 朱红文 刘文斌 林红霞

谢文东 陈 波 何志武 刘瑞宁

张建伟 王世光 刘永坚 周学勤

康健明 李 陆 张京路 郑 刚

周 丰 吴 洁 卢洪祥 萧仕平

杜斗恒 李明田 李 静 刘 莉

蒋先进 戚 灿 萧凤云 丁 素

导言

张静如 王炳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犹如一艘巨轮，在“惊涛迭拍岸，骇浪数丛生”的历史航道中已行驶了半个世纪。回溯这一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巨轮那高亢激昂的汽笛声：开国奠基，凯歌行进，艰难探索，改革扬帆，大潮新起……

一、凯歌行进：我们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他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并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但是，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又是错综复杂的，新生的共和国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团结率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斗争，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努力。

在军事上，人民军队为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而继续作战。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8个月的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30万人，解放了西南、华南广大地区。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至此，全国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外，全部获得解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统一。

在政治上，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各地在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基础上，首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地方人民政权的最初形式。在条件许可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到1952年底，全国所有的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没收官僚资本的斗争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到1950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它们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人民政府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物价飞涨，投机资本扰乱市场是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面临的一项严重挑战。为了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同投机资本进行了较量。经过努力，到1950年3月，全国物价趋向稳定，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稳定物价斗

争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延续十多年、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局面,建立起物价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指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悍然出兵,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根据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内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和谈判,中国人民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约有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此,彻底消灭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但是,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不甘心失败,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因此,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遗留的反革命势力,平息了历史上从未平息过的匪患,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时期,党和政府还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逐步开展民主改革;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了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取缔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在当时也都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

共和国建立头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作为中心任务。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定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家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对经济建设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在国民经济恢复中,人民政府一直把农业的恢复视为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国家从减轻农民税款,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发放农贷,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奖励丰产,开展互助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人民政府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人民政府把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的恢复摆在优先的地位,并投资修筑新线路。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国营商业使之成为恢复和发展国内外贸易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大力发展合作社商业使之成为国营商业的重要助手。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国家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其消极作用。1950年5月,国家对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最突出的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通过调整,市场情况进一步好转。

1951年底,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查处了一批腐化堕落分子。在“三反”运动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同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密切相关。于是,从1952年1月开始,在全国城市中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配合“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的“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使年轻的共和国更加兴旺发达。

建国三年来,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不论在规模上、速度上、主要产品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党和政府在领导人民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和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的斗争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首先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

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其次是坚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把人民群众在政治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引导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去。第三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支持。这就使党能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的目标是，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体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是一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并举的计划。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项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体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当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加紧进行之时，国家的政治建设、外交工作等方面也都取得重大进展。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记载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胜利成果，指明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坚决实行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外交政策原则。这一原则立场，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和理解。以前苏联为首的当时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地承认了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久，中国又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到1958年8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31个。

到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更加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更加紧密。这个事实表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有能力破坏旧世界，而且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

二、风雨二十年：饱尝探索的艰辛与苦痛

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里，共和国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道路，饱尝了胜利的喜悦、探索的艰辛和失误的苦痛，留下了永远应该汲取的经验与教训。

1957年至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国家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首先,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6年同195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倍左右,国家财政收入总额增加了94.4%,国民收入总额增加了近80%。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新建和扩建了大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其中包括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基地,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大庆、胜利、大港等大油田的开发建设,使我国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立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十年新修铁路近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为备战而大规模进行的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对改善我国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布局和调动地方建设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十年中,农业总产值增长24%,粮食产量增长11%,棉花产量增长61.7%。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20多倍。

其次,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成就显著。十年中,我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卓著。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十年中,国防尖端技术成果尤为突出。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从1958年到1961年,国防尖端技术的队伍建设和研究,实现了从空白到长足的进步。在导弹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对地导弹;中远程导弹的设计和关键部件的研试也已开始;导弹研究院已经拥有数千人的大学毕业以上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在原子弹方面,大学毕业以上专业技术干部队伍也有了数千人。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加强“两弹”(原子弹和氢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4日,爆炸氢弹成功。中国只用了三年时间,踏出了由原子弹到氢弹的路。这一辉煌成就,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也有有力地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十年间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1957年到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10万人,分别为1950年到1956年的4.9倍和2.4倍。经过调整,高等教育质量比较高,出的人才和成果比较多。另外,还有近万名留学生学成回国。这个时期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各行各业的业务技术骨干,在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再次,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初步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这一根本思想。1956年上半年酝酿确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性和长期的正确方针。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春,毛泽东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即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劳动制度并存,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并存;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

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制定的一系列工作原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这个时期的一些观点和政策虽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否定,但是它们为后来继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最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所表现的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十年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等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国还在这个时期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面对困难,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表现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顽强的斗争精神。这个期间各条战线都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和优秀集体。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党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焕发出了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1957年至1966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后来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个时期也是“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时期。

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对极少数确实存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了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开始重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错误判断成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反右派斗争发展起来的“左”的指导思想,很快扩展到经济建设方面,逐步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正确方针,致使经济建设事业遭受到严重挫折。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随后,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现实使人们逐步清醒过来。从1960年冬起,中共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实施,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然而,“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主要是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和科学教育文化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差。

由此可见,在十年探索中,存着两个发展趋向:一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即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积累的经验;一是错误的倾向,即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两种趋向在许多时候是相

互渗透和交织的，有时一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存在。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的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使“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却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阻挠。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邓小平的整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引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的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也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一是“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党的领导层占居主导地位，党和人民遭到极大灾难，这是支配全局的趋向；同时，在全国上下还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抵制、批判和抗争，这是被压制的趋向。但它却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逐步发展，终于迫使“文化大革命”结束。

二十年“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二十年“左”的和极左的错误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首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其次，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坚持集体领导原则，不能容许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家长制等现象。最后，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把书本当教条，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地分析国情，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总之，二十年探索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真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三、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路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实际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工作。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对于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重大作用，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往开来的转折点，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标志着历史新时期的开始。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这个主题，全会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针；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有步骤地去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科学地阐述了从实际中提出的许多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形势。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巨大勇气和远见卓识。

改革开放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对外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它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

改革开放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中共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农业始终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部分，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 and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选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党和政府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几年工夫在全国推开。废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八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接着，中共中央相继决定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也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敏锐观察的结果。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突破，是从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功。兴办经济特区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之后，中央又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开放沿江、沿边城市和全国各省省会及一些有条件的城市。全国范围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在实施中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多方位开放，即向世界上无论哪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实行开放；二是多形式的开放，即采取扩大外贸、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发

展国际旅游等多种形式,使对外开放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三是多层次开放,即从试办特区开始,滚动式地逐次推进,在不同层次实行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样,我国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组成的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外开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国策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坚持走这一强国富民之路,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任务的实现,需要一个稳定良好的国际环境。通过对当代世界局势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我国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我国政府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的发展变化,为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大陆和台湾的统一问题,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治构想。“一国两制”的方案成为我们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进步的最佳模式和根本途径。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直辖于中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保持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因此而变化。1987年4月13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用“一国两制”模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为台湾与大陆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范例。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海峡两岸之间封闭隔绝的局面已被打破,每年来大陆探亲、旅游、考察、交流、经商的台胞人数逐年增加。随着两岸同胞交往和相互理解的日益扩大加深,随着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台湾问题在两岸人民的努力下也必将克服种种障碍,按照“一国两制”的方案得到解决,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重大突破。大会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过这个阶段。大会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也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主要经验。

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在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党和政府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全国政治局面趋向稳定。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已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替。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0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

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确定了今后十年和“八五”期间的奋斗目标与基本指导方针，确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确定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部署和措施。根据《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经1991年3月至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后正式付诸实施。

1992年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他的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中国出现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科学的概括，指出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会郑重地把这个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大会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织各方面力量，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规划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蓝图。改革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整个经济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在1991年到1995年的“八五”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提前五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在“八五”期间年均增长7.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5%，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这些巨大成就是在中央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为解决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防止经济过热，从1993年初，中央加强了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到1996年，中国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整个国民经济进入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八五”计划顺利完成之际，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务院根据《建议》精神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这个《纲要》。《纲要》提出，经过15年的努力，中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将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经济面貌将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为下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个奋斗目标展现了21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景，表达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雄心壮志。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步开展了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引导全党全国人民逐步加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一贯的情

况。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邓小平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削弱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效果，对促进改革、发展、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把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为全面部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199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决议》清醒地估量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对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论述作了新的概括；把思想道德建设摆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明确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规范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涵，强调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强调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决议》指出：“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个《决议》既有高度的战略性、思想性、指导性，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大事。1997年6月30日午夜，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缓缓降下。随着“米”字旗的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0点整，激动人心的神圣时刻到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0时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洗雪了中华民族蒙受的百年耻辱，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夙愿变成了现实，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将产生深远影响。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事实必将证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治理好香港。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江泽民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这个报告从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科学地总结过去，筹划未来，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国际国内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鲜明主张、指导原则和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一致赞成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章。这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大会强调，全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使党的中央领

导集体向着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泽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五大，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对于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满怀信心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2月25日至26日，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经与党内外协商形成的，拟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决定将上述两个名单分别向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建议国务院将这个方案提交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全会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些制度。全会认为，开好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3月5日至19日，举世瞩目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使中共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的宏伟任务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李鹏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此间举行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跨世纪的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的产生，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

中共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开拓前进，要在21世纪里谱写中华五千年文明新的壮丽篇章。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把新一届政府的主要工作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就是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关于“三个到位”，第一个“到位”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个“到位”，就是确定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这个目标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第三个“到位”，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五项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朱镕基强调指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加深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中国政府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果断采取措施，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和投资等宏观调控手段，推动我国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给予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国家以必要的援助，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作出了贡献。

1998年入汛以来，气候异常，暴雨成灾。长江出现全流域性大洪水；东北嫩江、松花江爆发百年不遇的超记录特大洪水。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广大军民协同作战，同滔滔洪水展开一场气吞山河的搏斗，夺取了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

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继续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的各项改革继续深化。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停止经商的工作按期完成，党政机关同所办经营性公司脱钩的工作全面展开，反对腐败、打击走私和各种犯罪活动的斗争深入进行。

1999年，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年初，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载入

宪法，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中国政府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以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采取措施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加大扶贫攻坚力度，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基本利益。机构改革继续进行，反腐倡廉工作常抓不懈，以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为目的“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在全国范围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全面展开。党和政府果断地处理了邪教组织“法轮功”问题，全国兴起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热潮。

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进入新的阶段。年初，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随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受聘震动全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99年6月召开，高等教育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以此为契机全面铺开。1999年11月21日，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在历时21小时11分环绕地球运行完成科学试验任务后，在内蒙古中部地区安全着陆。这是我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次飞行试验，它的成功，对我国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航天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我国人员伤亡和馆舍严重毁坏。中国政府和人民严正抗议霸权主义势力对我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中国政府强烈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坚决批驳李登辉鼓吹的“两国论”，正告台湾当局顺应民心，正视现实，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早日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努力。

1999年12月19日深夜，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12月20日零时，伴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旗庄严升起，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这标志着我国在实现完全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9年底，我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热烈而隆重地举行庆祝活动，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的新千年。

纵观历经沧桑的过去，展望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从中可以吸取继往开来的丰富经验和巨大动力。向前看，新世纪的灿烂霞光在向我们召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隆重庆祝了五十华诞，开始走上下一个五十年的辉煌历程。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这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意愿的雄心壮志。要奋斗要发展，就会有困难有风险。但是，任何困难和风险都无法阻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我们必将胜利地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凡 例

一、本书记录了1949年10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发展到逐步壮大的历史过程，是一部采用逐年、逐月、逐日方式编写的纵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程的资料性工具书。

二、本书以编年体为主，兼采新闻报道与纪事本末体之长。报道立足于“当时”或“本日”，强调新闻感，避免呆板、枯燥，力争做到将历史化为新闻，将新闻穿成历史。

三、本书主体部分按“月表”与“报道”两大版块设计。“月表”记录当月重要大事，按时间顺序排列，如内文有进一步报道，则在句末注明“报道”二字。“报道”一开始即注明月、日，比如7.7、8.13等。若无确切日期，则以“本月”或“本年”表示。

四、本书主体部分前面设有“导言”，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进程、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和教训。

五、本书每页眉线上方标有本页事件发生的年份，便于读者按时间快速检索。

六、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根据内容需要，插配二百四十余幅珍贵历史照片。